

新保守主义语境中的美国朝核政策

潘 锐

【内容摘要】新保守主义继承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对所有敌对的意识形态都不共戴天的杰克逊主义以及尼克松所信奉的现实主义，反对受制于国际组织与多边主义的干扰，主张美国在必要时必须使用武力来维护它的理念和利益，唯有扩展民主才能确保美国的安全。布什政府内部在朝核问题上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与对朝观，其中新保守主义占据了上风，并主导了美国对朝政策。布什政府的朝核政策也一反克林顿政府相对温和的“接触战略”而制造了新朝核危机。

【关键词】新保守主义 美国外交 美国朝核政策 布什政府

【作者简介】潘锐，江苏南京人，1962年出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200433。

里根时代勃兴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在经过短暂沉寂后，乘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之东风，再度左右美国内政与外交。一批新保守主义者同时把持著名思想库和舆论喉舌，为之摇旗呐喊。新保守主义从而成为解读布什政府政策的关键词。本文试图就新保守主义及其对布什政府朝核政策的影响进行探讨。

—

新保守主义是美国 60 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保守主义，由于有别于美国共和党传统保守主义，因此称为“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主要是从自由主义转变而来。一些左派自由主义分子，反对 20 世纪 60 年代的自由主义的激进变革，思想趋于保守，从而形成新保守主义。他们的思想根源和传统保守主义不一样，传统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埃德蒙·伯克思想基础上的。而新保守主义并不信奉伯克的思想。新保守主义信奉武力至上的原则，主张在外交上奉行强硬政策，希望美国建立真正的霸权帝国。美国“9·11”后“先发制人”军事战略，就是新保守主义的杰作。而“先发制人”的典型表现，便是伊拉克战争。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崛起于 20 世纪 30—60 年代，其真正的鼻祖是法国人杰可夫。这位俄国贵族后裔反对法国启蒙运动，却重新发现了黑格尔的“意识也能影响存在”之历史观，以新保守主义阐释存在主义。他的弟子、芝加哥大学教授列奥·斯特劳斯将这套思想传入美国。列奥·斯特劳斯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遭受德国纳粹迫害而逃往美国的学者，坚信必须由一群精英分子来保卫美国民主。为了使西方民主更为安全，“必须努力使整个世界民主化，使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中的社会变得民主”。斯特劳斯认为，反抗暴政，对付“野蛮”的敌人，是西方人应有的“自然权利”和责任，可以不受现存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约束。^①斯特劳斯写了许多优秀著作，更重要的是他带出了一大批学生，而其学生的学生们目前正活跃在美国政坛上，并实施着其政治理念。

作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斯特劳斯在美国颠覆了数百年以来的自由主义话语。而新保守主义者继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对所有敌对的意识形态都不共戴天的杰克逊主义以及尼克松总统所信奉的现实主义，^②

是各种思想的集合。他们反对受制于国际组织与多边主义的干扰，主张美国在必要时必须使用武力来维护它的理念和利益，唯有扩展民主才能确保美国的安全。新保守主义显然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不同于法西斯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追求的是各国在现存秩序内的权力平衡，主张用权力制约权力。而新保守主义的目标是新帝国。但新保守主义也面临着诸多阻力，首先是美国国内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传统的阻力，新保守主义目前的话语权只是暂时的，自由派的东山再起则意味着新保守主义的衰落；美国国内对新保守主义有不少批评，例如，“新保守派使美国的国际关系不幸走上弯路，偏离了共和党一贯以兼顾各方利益、注重达成共识和节约使用资源为特点的国际主义路线……其行为更像是一个只为自己着想的特殊利益集团。”^④其次，美国盟国的异议和反对，美国很难冒西方分裂的风险而一意孤行；再次，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支持、不追随。

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克里斯托尔父子、沃尔福威茨、理查德·帕尔、罗伯特·卡根等，他们与芝加哥学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非沿袭冷战时期的思维包袱。他们奉行的理念主要是针对后冷战时期的形势特征，关注的重点不是预算和小政府，而是发展；他们有左派根基，相对较关心社会问题，但只赞成改革而不要革命；强调个人利益，以个人主义态度看待人和社会关系。新保守主义有两个核心理念，一是对历史的哲学看法，或称“大写的历史”，其研究的目的是关注将来的发展。二是借鉴过去的经验教训，或称“小写的历史”。“大写的历史”的概念，建立在批判马克思生产力学说的基础上，认为理念本身就可以创造历史，正如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所说：“从长远来讲，还是理念决定历史发展方向”，^④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人类最高的制度，这其中英、美的政治理念又是最好的，所以应该向全世界推广。“小写的历史”在痛心疾首地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后，认为现在的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很相似，中国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威廉二世的德国，而一个对现状不满而

正在上升的大国必然要采取军事手段来改变秩序，所以必须对其进行遏制。

新保守主义的势力主要来自布什政府内部，其成员包括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与费斯，副总统切尼的办公室主任路易斯·利比，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近东与北非事务的官员艾廖特·阿布拉姆斯等。这些参与决策的新保守派都主张采取富于进取性和单边行动的政策来推进民主、人权、自由市场经济以及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国防部前助理部长兼国防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理查德·帕尔亦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一员大将，对布什外交政策进行幕后策划。新保守主义势力并不包括更高一层的政府领导人，如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等。

新保守主义是美国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一支新军。重视历史经验、强调传统价值、反对激进变革和视自己与民主一体是所有保守派一以贯之的原则。所不同的是，传统保守主义体系分散，没有坚强的理论框架，并有显著孤立主义色彩；而兼具自由主义历史背景和保守主义思想渊源的新保守主义，不仅拥有完整的理念和活跃的精英，而且将关注焦点更多由国内政治转向国际事务，携原教旨主义式热情，谋改造外部世界之图略。意识形态显著突出是新保守主义的一大特征。布什班子可以说是美国现代意识形态印记最鲜明的一个政府，其重大国内外政策无不受此驱动。布什不仅将美国的某些对手称为“邪恶势力”，说反恐是一场“文明”针对“野蛮”的斗争，而且一再强调“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殊死搏斗，并要求全世界做出选择：要么是美国的朋友，要么是美国的敌人，没有第三条道路。^⑤在西点军校讲话时，布什宣称美国代表“人类进步的唯一仅存模式”，颇有“历史终结”之意；在纪念“9·11”一周年文章中，又无数次提到“共同的价值观”。^⑥

美国新保守主义大行其道，有其内外气候的相互策应：第一，正在向右摇摆的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一般说来美国对外政策像一个钟摆，在晃动一定时期后会趋向中线，那么小布什上台后

这个钟摆还在向右偏斜的途中，尚未到达极限。因为民主党在国内经济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却意外地丢失权柄，说明整个美国社会的民意和思潮正向保守主义涌动。尤其是“9·11”之后孤立主义被彻底打压下去，为新保守主义一枝独秀创造了空间。布什政府反对限制枪支、退出国际刑事法庭的种种做法，如果没有共和党的整体保守化，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共和党已经从华尔街的金融政党变成了主流政党”（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汤姆·费里语），与此同时，北方稳健派却逐渐丧失地盘。第二，世界政坛向右转的影响。全球化时代垄断资本的扩张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使代表军工集团和石油集团势力的各国保守派得以大行其道。第三，政治右派与宗教右派结合，宗教色彩浓厚。共和党右派与“原教旨”基督教保守主义势力干系极大，甚至触碰到美国传统的“政教分离”原则。据称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每天上班后鼓励同僚进行“祷告会”；联邦政府各种社会福利拨款将有教会参与发放，布什政府以反对堕胎为借口中断对联合国有关计划生育机构的资助，都是基督教原教旨意识形态的明显表现。第四，深层次的种族文化倾向。新保守派的核心成员几乎都是犹太裔，尤以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为代表，公开抛弃阿拉法特和对以色列一边倒，反映出共和党右翼与犹太游说集团的某种合流。

新保守主义崛起是冷战后世界战略力量失衡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美国无人能比的实力所造就。布什政府名为保守，实为激进，比所有前任都更迫切想达到并维护“美国治下的和平”，其压倒性实力越强，左右国际棋局的霸气也越盛，布什政府上任几把火，与克林顿政府从战略到策略划开了界限。新保守主义的理念驱动，确实实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外战略决策。“布什主义”的出笼，是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冷战后外交政策的影响达到登峰造极的标志。不仅政府内部有里根旧臣在新条件下继续推行新保守主义外交，而且一大批在野的新保守主义者凭借自己的学识经验、人际关系，以各种方式推波助澜，推动布什对外政策不断朝

着新保守主义方向演变。

新保守主义对国家安全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和战略。首先是美国安全的根源，他们与克林顿甚至老布什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他们不关心具体问题，而直接指出冷战后对美国最大威胁是所谓的“失败国家”，特别是“流氓国家”，要消除威胁的根本办法只有“改变政权”，用国际体系来套用或者指望“暴君”良心发现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沃尔福威茨把端掉萨达姆的目的解释成“变伊拉克为中东第一个民主国家”。其次，把确保国家安全的条件建立在世界力量不平衡之上，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美国，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为此就要极力打造美国霸权，使别国对美国望而生畏。同时，新保守主义者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霸权来粉饰其赤裸裸的帝国霸权，为此，侵占他国领土和把别国纳入势力范围乃是美国在全世界传播民主和自由。再次，在实现国家安全的手段上不再学克林顿抛出香饵，比如用市场经济的吸引力来说服他国，而是强制性的，拒绝骑墙和灰色地带。“9·11”后，以新保守主义“预言家”纽特·金里奇为首的新保守派就曾要求布什迫使世界上所有国家作出一个简单选择：支持美国还是支持恐怖主义。

“9·11”事件的发生是一个转折点，布什政府几乎全面采用了新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在2002年抛出了大力推进反恐战争、制止毁灭性武器扩散、先发制人以及推行提升中东民主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前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斯蒂芬·哈尔珀便表示，虽然布什总统给了新保守派以崭新机会，但布什上任时并没有打算推行迎合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是“9·11”让新保守主义“劫持”了美国外交政策。^⑦

虽然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但布什并没有接受新保守主义者要求推翻平壤与德黑兰政权以确保美国安全的主张，而是愿与之对话。布什也不顾新保守主义分子的反对，主张阿以和谈，争取中东和解。如果占领伊拉克最终变成一场灾难，那么新保守主义肯定会成为替罪羊。而且，新保守主义精英大多并无军

事经验，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他们虽有强烈的信念，却对世界局势的复杂性与美国实力强权的局限性缺乏足够认识。伊拉克战争、朝鲜核危机以及巴以冲突已经使布什感到力不从心，穷于应付，而且也遭到美国公众越来越多的责难。伊拉克战争乃美国单边主义主导下进行的，是一场新保守主义的战争，它同时表明，世界上并无能阻止美国的力量。但美国通过军事方式能否真正解决伊拉克问题、解决中东冲突问题以及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恐怕仍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二

布什政府内部在对朝核问题上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与对朝观，六年多的美朝关系起伏也印证了这一点。

第一种对朝观以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为代表，包括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副总统办公室、国防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的一大批中高级官员，也包括大量进入政府的“蓝队”成员。他们认为，朝鲜是一个流氓国家，朝鲜领导人不会遵守协议，永远不会放弃核能力，对朝鲜妥协只能有助于维持不会信守义务的“流氓政权”。^⑥他们反对韩国金大中总统与朝鲜接触与和解的“阳光政策”，主张美国退出《美朝核框架协议》，实施基于“政权更迭”基础上的强硬的对朝政策，希望以此加速朝鲜政权的垮台。其看待朝鲜时更是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认为朝鲜是共产党国家，是专制政权，性质上与前苏联相类似，不仅会挑战美国，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威胁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此外，他们对克林顿政府的朝核政策深表不满。他们对朝鲜能否遵守协议和不扩散义务表示怀疑，认为克林顿对朝实行的是“绥靖”政策而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美朝核框架协议》既没有使朝鲜中止其核计划，也没有减少朝鲜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只是美国单方面的让步，从而鼓励了朝鲜的侵略态势，因此是一个失败的协议，要求实施新的对

朝政策。^⑨

新保守主义在“妖魔化”朝鲜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将朝鲜同冷战后期苏联“邪恶帝国”相提并论，2002年提出的“邪恶轴心”之说令世人震惊；再三强调美国价值观与正义，作为划分敌我标准；借布什总统之口，再次在2003年《国情咨文》中攻击朝鲜说：“在朝鲜半岛，受一个压制性政权统治的人民生活在恐惧和饥饿之中。……今天，北韓政权利用它的核项目制造恐怖并以此相要挟。美国和全世界绝不能接受讹诈。”^⑩ 布什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称朝鲜为“一个另类，长期以来反复做出同样行为：他们和你达成协议，然后又反悔，接着开始讹诈对方，这就是布什坚持要其邻国和它进行谈判，并联合起来解除它的武装的原因”。^⑪

对新保守主义对朝观的制约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中、俄大国因素。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大国和朝鲜的友好国家，在朝核问题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中国在朝鲜半岛的主要利益和关切体现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半岛逐步融入东亚经济合作过程和经济一体化之中；淡化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中国的立场和政策制约了美国对朝军事打击的选择，同时也领导和促使“六方会谈”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俄罗斯与中国在朝鲜半岛有着相似的立场，共同反对美国的军事解决方式。1994年5月18日，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曾向克林顿总统提交一份报告：如果美国对朝开战，在最初90天里，美军将死伤5万人，韩国士兵死亡可能超过49万，美财政支出超过610亿美元。而且，朝鲜战争也是笼罩在美国人心头的一大阴影。美国人意识到，中、俄两个大国是不会允许在其邻国发生战争的。^⑫

第二，日、韩盟国因素。作为美国的亚太盟国，日本和韩国均不希望朝鲜半岛爆发战争，也不希望争端升级而危及自身安全，特别是韩国，更积极主张通过外交方式不仅解决朝核问题，而且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迈进。韩国甚至期望由于其特殊的当事

国身份，能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主导性作用。

第三，安全因素。反恐战争是美国的当务之急，漫长的伊拉克战争牵制了美国的主要精力，所以朝鲜并不是美国新保守主义针对的主要目标，也不是布什政府的主要目标。

第四，国内政治因素。新保守主义的内外政策主张不能不受民主党的掣肘，只是时间问题；同时共和党内部传统保守阵营人士都是务实派，也不能不对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包括对朝政策产生影响。

第二种对朝观以国务卿鲍威尔为代表，包括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些主张现实主义的官员。他们在政府内部处于少数地位。他们认为，与朝鲜交往和接触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应致力于建立一种稳定而非对抗的美朝关系。在他们看来，通过接触，以可能的经济援助、安全保证和其他外交鼓励手段为交换条件来说服朝鲜放弃核开发是可行的。^⑨美国通过与朝鲜交往和接触可以促进朝鲜的变化和变革。2001年3月6日，国务卿鲍威尔在与到访的瑞典外长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即表示，布什政府将沿续克林顿政府对朝接触政策。^⑩

虽然这种观点未占据布什政府主导地位，但它也是布什政府朝核政策制订过程中需倾听的声音之一，助理国务卿凯利的数度访朝均表明这种务实、理性的对朝观在一定程度上被接受，布什政府朝核政策不可能完全排斥该对朝观。

三

美国朝核政策在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受到新保守主义的极大影响和干扰，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其政策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政策评估和调整阶段，时段为小布什上台到2002年10月朝鲜核危机再次爆发。在本阶段，由于小布什政府实行“逢克林顿必反”（Anti-Bill-Clinton）政策，在新保守派的

强烈要求下，美国对朝鲜实行强硬路线，导致美国对克林顿政府的朝核政策予以搁置，并以重新评估对朝政策为由，中断了与朝鲜的对话和接触。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进一步把本土安全作为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点，在新保守派的推动下，布什政府实施了更为强硬的朝核政策，从而导致了克林顿执政后期已经缓和的美朝关系又重新紧张。更令美朝关系交恶的是，2002年1月29日，布什总统在其就任的首次国情咨文中，接过里根总统“邪恶帝国”的概念而提出“邪恶轴心”的概念，以朝鲜对外出口导弹技术和发展核武器为由，将朝鲜与伊拉克、伊朗一起并称为“邪恶轴心”，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提出美国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阻止其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⑤尽管从逻辑上而言，三个国家并不构成“轴心”，相互之间不同点甚多，两伊之间甚至持续了8年战争。就朝鲜核问题而言，美国始终怀疑朝鲜秘密发展核武器，美国的情报部门就一再声称早在数年前便发现朝鲜秘密恢复了核计划。美国不仅公开指责朝鲜秘密研制核武器，甚至声称朝鲜已拥有核弹，一再要求对朝鲜进行核查。而美国国会则不愿履行为朝鲜供应重油的协议，从而使两国在履行《美朝核框架协议》的问题上争论不断，日趋激烈。但在这一阶段，由于布什政府内部的新保守派主张把伊拉克问题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同时相对于朝核问题，美国当时更关注朝鲜导弹开发问题，希望以此推进日本和美国联合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因此，在对朝鲜施加更大压力的同时，美国仍准备恢复与朝鲜的谈判。2002年2月5日，国务卿鲍威尔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愿意与朝鲜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无前提条件地”恢复对话。4月，布什总统本人在一个备忘录中表示，美国将继续从资金上支持《美朝核框架协议》^⑥。

第二阶段为危机——化解危机——危机升级阶段，时段为2002年10月朝核危机再次爆发到2006年10月朝鲜核试验。自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较量完全公开化，并

不断升温。在新保守派主导下，布什政府虽然表面上一再申明谋求通过和平或外交途径解决，而实际上却在设法从外交上孤立朝鲜并向其施压。2002年12月，美国终止对朝燃油供应后，美方又放风准备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实行经济制裁。布什政府官员明确表示，除非朝鲜宣布放弃核计划，否则美国不会与之对话。针对布什政府的强硬态度，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重新启动被冻结的核设施，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观察员撤离朝鲜。这表明，美国外交孤立和拒绝对话的政策不仅没有奏效，相反却促使美朝外交战进一步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拜登以及刚刚接替他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格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布什政府与朝鲜进行对话。美国《纽约时报》社论也指出，布什政府目前的朝鲜政策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会加剧危机，迫使朝鲜走上核武装道路。文章强调，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与朝方进行谈判。^⑥在国内以及盟国的压力下，美国终于表示愿意对话，这是布什政府在朝核问题态度上的一个变化。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2003年4月23~25日，中、美、朝三方在北京举行了“三方会谈”。虽然此次会谈未取得预期的进展，但它开启了通过政治对话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大门，成为化解朝核危机的有效方式。继“三方会谈”后，2003年8月27~29日在北京举行了由美国、朝鲜、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共同参加的首轮“六方会谈”。“六方会谈”的举行，表明朝核问题纳入了国际机制之中。2004年2月25~28日、2004年6月23~26日朝核第二轮、第三轮“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在第五轮第一阶段会议结束后，六方会谈因朝鲜反对美国的金融制裁而陷入僵局。2006年10月9日，朝鲜宣布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此举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

第三阶段为危机升级——化解危机阶段，时段为2006年10月至今。在朝鲜核试验之后，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国家均对此反应激烈。由于新保守派已陆续离开布什政府，更由于美国深陷

于伊拉克,新保守主义在布什政府中的影响力大为下降。美国目前已不想让朝核问题趋向恶化,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业已顺利举行,美国对朝鲜的金融制裁也已取消。美国的考虑为:一是美国当前的主要战略重点在于应对伊拉克局势和反恐,在其它地区出现新的危机特别是朝核危机,将使美国陷入新的被动,这是美国所不希望的。二是美国面临比朝核问题更重要的伊朗核问题,就两者的紧迫性和严重性而言,伊朗核问题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利益,被美国和以色列视为最现实的威胁,伊朗核问题乃美国的心腹大患。三是美国对伊朗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决的选择,但如果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就不可能在朝核问题上同样采取强硬手段。如果能通过软的一手使朝鲜回心转意,放弃核计划,美国还可将此作为范例,影响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

注释:

① 李强:《美国新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政治哲学解读》,http://www.gongfa.com/liqiangyilake.htm

② 于滨:《“新”保守主义的昨是与今非》,上海美国研究所编,2003年9月。

③ The Washington Times, Feb. 11, 2003.

④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1989, pp. 3 - 18.

⑤ 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讲话,2002年6月1日。

⑥ 布什总统纪念9.11一周年讲话,2002年9月11日。

⑦ The Washington Times, Feb. 11, 2003.

⑧ Philip C. Saunders, “Confronting Ambiguity: How to Handle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Arms Control Today, March 2003.

⑨ Daryl M. Plunk, “Time for a New North Korea Policy,” July 2, 1999, www.heritage.org.

⑩ George W Bush, “The President’s State of Union Address,” Jan. 28, 2003,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3/01/20030128>.

⑪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2, 2003.

⑫ 阮宗泽:《朝核危机的成因与发展趋势》,《思想理论与教育导刊》2003年第3期。

⑬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2, 2003.

⑭ “Chronology of U. S. -North Korea Nuclear and Missile Diplomacy”,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January 2003.

⑮ George W Bush, “The President’s State of Union Address,” Jan. 29, 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

⑯ 张业亮:《布什政府对朝政策与朝核危机》,《美国研究》2004年第1期。

⑰ The New York Times, Jan. 7, 2003.

U. S. Policy on Korean Nuclear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Neo-Conservatism

Rui Pan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Inheriting Wilson’s idealism, Jackson Doctrine that contains a potent hatred against any hostile ideologies, and realism that believed and implemented by Nixon administration, the Neo-Conservatism opposes any intervention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ultilateralism. It maintains that U. S. must protect its convictions and interests by force if necessary, and that the expansion of democracy is the only reliable measure for guarantee of U. S. security.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handling of Korean nuclear issue and concerning the perception on North Korea, among which the neo-conservatism takes a prevalent status and orients the U. S. policy on North Korea. It is owing to this

doctrine that Bush administration formulated its own policy on Korean nuclear issue, which is a drastic alteration from the relatively mild “engagement strategy” of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that a new crisis happened on Korean nuclear issue.

（审读：方秀玉）